

历史鳞爪

——中国近现代史专题

程利 著



历史鳞爪

——中国近现代史专题

程利 著



 云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历史鳞爪：中国近现代史专题 / 程利著. — 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2012

ISBN 978-7-5482-1199-0

I. ①历… II. ①程… III. ①中国历史—近代史—研究
②中国历史—现代史—研究 IV. ①K250.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12652号

历史鳞爪

——中国近现代史专题

程利 著

策划编辑：赵红梅

责任编辑：冯 峨

封面设计：王娅一

出版发行：云南大学出版社

印 装：云南大学出版社印刷厂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 张：15

字 数：280千

版 次：2012年8月第1版

印 次：2012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482-1199-0

定 价：35.00元

社 址：昆明市翠湖北路2号云南大学英华园内

邮 编：650091

电 话：0871-5031071 5033244

网 址：<http://www.ynup.com>

E-mail：market@ynup.com

目 录

第一篇 社会心态与社会变迁

心态史与中国近代社会研究	(1)
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心态	(8)
五四时期爱国知识分子的集结与分化	(16)

第二篇 人物个性与成败荣辱

张学良的个性与“西安事变”	(25)
杨虎城的个性与“西安事变”	(33)
龙云和蒋介石的合与分	(39)
海伦·斯诺的个性与她的事业和婚姻	(48)

第三篇 国际交通线与云南社会发展

滇越铁路与云南社会发展	(58)
滇越铁路与云南交通近代化	(67)
滇缅公路与抗日战争	(74)
滇缅公路与云南战时经济	(82)

第四篇 日军地图与入侵中国的第二条战线

日军进攻中国第二条战线战略的形成与破产	(89)
侵华日军云南地图与日军滇西战略	(98)
滇西抗战与日军侵华的第二条战线	(105)

第五篇 武汉近代社会的变迁

晚清武汉社会文化的变迁	(111)
武汉近代制造业盛衰的历史原因与现实启示	(121)
沦陷时期日伪在武汉的殖民奴化教育	(130)

第六篇 近代中国女性的教育与就业

近代中国社会变迁与女子教育的发展	(139)
近代中国的妇女就业与和谐社会构建	(148)

第七篇 民族团结与宗教和谐

强化凝聚力 回汉一家亲	
——曲靖市在回民中开展的民族团结教育	(162)
增强民族团结 保持宗教和顺	
——曲靖市民族和谐关系的构建	(175)
神圣与世俗	
——南传佛教在云南傣族地区的适应和演变	(189)
传承与创新	
——西双版纳傣族的佛寺教育	(198)
现实与困境	
——西双版纳打洛镇傣族学生厌学、辍学的成因	(205)
佛寺与教育	
——宗教背景下的云南傣族教育发展策略	(211)
基督教与景颇族	
——对云南瑞丽市弄岛乡等嘎村的调查	(218)

参考文献	(225)
------------	-------

后 记	(233)
-----------	-------

第一篇 社会心态与社会变迁

心态史研究作为社会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一些长时段的社会现象，弥补中国近代社会研究中只注重英雄人物和重大事件的缺憾，从而加强对社会广大民众心态的研究，使一些问题能找到更为合理的解释。如近代中国社会接踵而来的民族灾难和亡国灭种的危机，就强烈刺激着作为民族精英的知识分子寻求民族复兴的道路，他们在由传统向近代转换和发展的历程中形成了爱国、忧患、救亡的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心态。在五四运动前夕，不同思想类型的知识分子结成反帝反封建新文化统一战线，五四运动以后，这支队伍却在较短时间内疾速发生了分化，这与他们的社会心态和行为模式是息息相关的，因而导致了他们对救国方略理解的分歧和文化价值取向的差异。



心态史与中国近代社会研究

一、心态史研究

近年来，社会史研究方兴未艾，各种社会史著作不断涌现，这些著作从不同侧面探讨了中国社会的构成、社会生活和社会功能等一系列问题，对深化历史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然而由于我国社会史研究起步较晚，很多理论还不成熟。

熟，对某些问题的研究还不够深入，影响了社会史的整体研究，其中表现最突出的就是对社会心态，或者说整体（群众）心理研究的不足。

历史学中“心态”、“社会心理”等概念是从西方借鉴过来的，根据著名史学家勒戈夫考证，法语的“心态”一词来自英语，英语的“心态”一词出现在17世纪，是17世纪英国哲学的产物，指的是集体心理，即“人们，一个特定的人们集团，等等”所特有的思想和感知方式。最初英语中的这个词只是哲学术语，而在法语中该词却很快广泛应用起来。启蒙运动后，法语“心态”一词具有了“心理状态”这一更为宽泛的内涵，后来被年鉴学派广泛应用于历史研究之中。^①

尽管早在希罗多德写下《历史》这部伟大的历史著作时，社会史就已经诞生了，但从严格意义上讲，近代社会史的确立是在年鉴学派产生之后。作为19世纪浪漫主义史学的叛逆者，年鉴学派在创立伊始就主张长时段、整体史的研究，以揭示真正影响社会发展的，在历史大海深处不为人知的广大人民的历史。1924年，年鉴学派第一代大师布洛赫出版了《巫师国王：论王权的超自然性》，这部书探讨了法国民众对于国王有治疗瘰癧病（淋巴结核）能力的信仰和对这一信仰的维持。布洛赫不是从传统的王权政治观念入手，而是选择了深入考察民众的集体心理状态这一方式，用类比的方法具体分析了民众的信仰内容，揭示了中世纪王权的社会基础。1932年，法国史学家勒费弗尔在勒帮《民族心理学》（1894年）和《集体心理学》（1895年）的理论指导下，运用集体心理理论和方法，从广大农民、市民的心理状态与社会经济状况、阶级斗争等具体条件的复杂联系出发，写下了《1789年的大恐慌》，论证法国大革命确实受集体心理状态的左右。1938年，另一位年鉴派大师吕西安·费弗尔发表《心理学》一文，系统地阐述了集体心理研究的基本理论与方法，明确地将集体心理（心态）研究与美国心理历史学（受弗洛伊德心理分析法影响）分开，最终奠定了现代心态史研究的理论基石，并在此基础上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

什么是心态史研究呢？勒戈夫说：“心态史研究日常的自动行为，心态史研究的对象是历史的个人没有意识到的东西，因为心态史所揭示的是他们思想中

① [法] 雅克·勒戈夫、皮埃尔·诺拉主编：《史学研究的新问题、新方法、新对象》，郝名瑞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272页。

非个人的内容。”菲利普·阿里埃斯也认为：“心态史所研究的是非常长的时段中的一系列隐秘的演进，这些演进是无意识的，因为生活于其中的人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些演进。”^①伊格尔斯也说：“历史的心理研究就是要用来自心理学和社会学的某些观念、方法和研究成果研究过去。”当每个历史学家宣称“我已创造了过去”时，历史心理学家则坚决地加上一句：“而我向你说明了历史的精神……我将看到过去的人，看到他的精神赋予他的生活。”^②这些表述在语言上虽各有不同，然而有一点却是一致的，即重视历史上人民群众无意识的“意识”及其对应的生活方式。归纳起来，所谓心态史，就是通过发掘人口统计、日记、报纸杂志、档案、遗嘱、田契、诉讼记录等不为人们所注意的原始材料，借用心理学的基本方法和理论探索人类过去下层民众群体共有的心态结构及其与当时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及演变过程，把历史的探寻点转到默默无闻的芸芸众生，通过分析广大民众一些明了、清晰的言语、习俗、传统、情感、智慧来解释历史现象，或者通过分析前人群体几乎不知不觉接受的、世代沿袭的观念和意识来说明历史问题。

当然，从社会史研究的角度来看，社会史必须以分析具体结构为基础，关注社会特有细节，诸如群体组织、家族、邻里组织、社团组织、商社组织、宗派组织，以及联系这些组织的网络的性质和力量，个人在这些关系网和复杂阶层中的地位以及由此造成的历史变化。但同时正如冯尔康教授在他的《三论开展社会史研究》一文中所言：“社会史不应停留在了解人们社会生活的表象上，还需要更深层研究人们社会生活所表现的心理状态和意识。”根据马克思主义学者的观点：人民群众是历史运动的主体，是人类物质财富、精神财富最基本的创造者。历史是人的活动，而人又是有思维、思想和情感的一个特殊物质，在每一个历史事件中，参与其中的人必然具有社会心理的驱动，包含着思想、精神、感情的因素。这些因素随着社会的进步、文明的发展，其作用将越来越大，对历史产生深刻的影响。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

① [法] 雅克·勒戈夫等编：《新史学》，姚蒙编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195页。

② [美] 伊格尔斯：《历史研究国际手册》，陈海宏等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94、101页。

结》中告诫人们在研究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时，要注意探讨广大民众、整个民族行动起来的思想动机及持久的、引起伟大历史变迁的动机。十分尊崇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历史学大师费弗尔也反复强调历史必须与心理学联合，取得心理学的支持，“历史必须由心理学家指点方向”^①。由此看来，重视广大民众的心理层面研究与坚持唯物主义不仅不矛盾，而且还为研究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提供了新的技术手段。

尽管心态研究作为一种技术手段可以极大地丰富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方法，然而过去我们受“左”的思潮影响，对此却很不重视，生怕有“唯心”之嫌。中国近代史由于在时间上距现在较近，在政治文化上对当代有十分强烈的影响，更由于近代社会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尖锐，更使人们对此讳莫如深，而把注意力完全转到政治史的研究上，研究重点主要是重大的历史事件、条约及关键的历史人物。近年来，社会史的崛起打破了这一现象，给近代史研究带来了一派生机勃勃的新气象。心态史也应借此机会，作为社会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介入到历史研究之中，去说明以前其他史学理论和方法难以说清或解释的许多重大社会问题。

近代中国社会由于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空前尖锐，面对西方先进文明的强大压力和中国社会对近代化的内在要求，其变迁十分剧烈。一波运动还未结束另一波运动已铺天盖地而来。重大的历史事件如战争、条约、事变、革命等接连不断，杰出的历史精英人物也层出不穷，历史学家的眼光往往被他们吸引，着重于对重大历史事件和人物的研究，而对下层人民群众的关注则明显不足，以至于有一些问题，如辛亥革命与农民的关系、城市贫民与近代城市化运动等的研究到如今还不太令人满意。恰恰相反，如果我们引入心态研究等方法，则一些问题的研究将会迎刃而解，一些以前没有说清楚的问题也可以找到合理的历史解释。由于心态是浸透于民族群体中的思想、感情、价值观、行为方式与规范的总和，是隐蔽在人们社会行为后面潜在的、无形的东西，在某一时间内是相对稳定的、变化很小而且传承性很强。因此利用它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一些长时段的社会现象，而这正是近代社会史研究中最受关注的。

^① 田汝康、金重远选编：《现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2页。

比如在研究洋货进入中国摧毁中国传统的自然经济这个问题上，早在19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通晓中西商务的郑观应就曾写道：“洋药水、洋丸、洋粉、洋烟丝、吕宋烟……洋酒、火腿、洋肉脯、洋饼饵、洋糖、洋盐、洋水果、咖啡……洋布之外又有洋绸、洋缎、洋呢、洋羽毛、洋漳绒、洋羽纱……洋针、洋线、洋伞、洋纸、洋钉、洋画……洋牙粉、洋胰、洋火、洋油……此外更有电灯、自来水、照相玻璃、大小镜片、铅、铜、铁、锡……洋钟表、日晷、寒暑表，一切好玩奇淫之具，种类殊繁，指不胜屈……以上各种类皆畅行各口，销入内地，人置家备，弃旧翻新。”^①甚至连地处内陆的四川也从汉口进货，供百姓消费之用。对此洋货之害中国人民早有觉悟，近代也有几次“拒洋货”运动，但洋货不绝，且愈演愈烈，原因是什么呢？我们以前从政治经济的角度出发作过很多解释，其实除此之外我们更应该从中国广大农民的心态上寻找答案。在中国近代社会，一般民众，特别是农民，长期以来由于经济水平低下，而将生活需求置于生活伦理的核心，形成了根深蒂固的节俭和实用观念。衣食日用以廉价、实用为第一原则，而洋货的价廉物美则非常符合这一大众心理。如对于火柴，过去用惯火镰的群众就夸赞说：“纤纤寸木药硝粘，引起灯光胜火镰，莫怪粹奴夸利用，缘他工省价还廉。”^②另外，从社会精神需求看，中国人是一个重视社会地位而且从众性很强的民族，十分注重自己在别人心中的身份和地位，表现在社会生活中就是很讲面子，哪怕在家里吃得苦一点，在外面一定要讲排场，由此产生了大量为应付社会生活而产生的社会需求。而一些洋货精巧、美观、新奇的特点正好适合了这种社会交往和社会生活中的心理需求，所以吸引人们购买使用，形成洋货流行与崇洋之风。广大群众对洋货的尊崇心理在陈作霖的《炳烛夜谈》中有十分生动的描述，他记道，在道咸年间“凡物之极贵者，皆谓之洋，重楼曰洋楼，彩轿曰洋轿，衣有洋绉，帽有洋莆，挂灯曰洋灯，火锅曰洋锅，细而至于酱油之佳者曰洋秋油，颜料之鲜明者，曰洋红洋绿，大江南北，莫不以洋为尚”。彭泽益也记叙当时的情形说，农民从实用的观点出发，平时习惯于穿土布，然而当“祭祀，或应酬，或往稠人广众之中，皆穿洋

① 郑观应：《盛世危言·商战》。

② 李静山：《增补都门杂吟·洋取灯》，载路工选编《清代北京竹枝词（十三种）》，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布，细密光泽者，以为外观美丽”^①。从当时整体社会心理的角度看，除开广大农民，当时一部分仁人志士确已认识到洋货所带来的“无穷之漏卮”是洋人“拜我资材”的经济掠夺，然而他们却是社会的少数，其思想不具有整体心理的代表性，而恰恰相反，那些新兴的资产阶级和城市市民对于洋货则明显表露出一股欣赏和羡慕的心态。这在当时流行的报刊、笔记及反映市民生活的《竹枝词》中反映得十分明显。因此，在整体的社会心理上广大民众对洋货是认同的，从中我们也就不难看出近代外国商品在中国泛滥的原因了。

二、社会心态与中国近代社会

另外，对于辛亥革命的成功和失败，我们也可以从社会心态的角度加以研究。从武昌首义一举成功，各省纷起响应的表象看，辛亥革命的胜利确实具有戏剧性的味道。而它在胜利后又迅速走向失效其原因则一直引起人们的思索。这一现象依然与整体的社会心态密不可分。从社会整体心理来看，当时农民、城市市民、军人、民族资产阶级（包括革命派和立宪派）都有一股强烈的反清思想，而民主革命的思想却没有前一种思潮那么普遍，因此推翻清王朝的斗争进行得十分迅速。然而一旦清王朝被推翻，传统思想上崇上、追求稳定的群众心理又占据上风，革命难以继续进行。如首义之区武昌在推出黎元洪这个旧官僚，革命有倒退迹象时，武汉的市民却是“欢声雷动”、“人民始为大定”，丧失了继续革命的心理动力。关于这一问题季云飞先生的《论辛亥前后国民政治心态的演化与辛亥革命的成败》一文已有详细论证，本文不再赘述。^②

此外，在中国近代有两次大规模的农民运动，一次是太平天国农民运动，一次是义和团运动。两者都给近代中国带来了巨大影响，然而两者在斗争的组织形式、宗教观念、斗争范围及影响等问题上的区别颇耐人寻味。太平天国发源于两广，入湖南后沿长江东下，在南京建都，建立了一个与清政府抗衡时间长达14年、势力范围波及18省的农村政权。在南方它发展得如火如荼，金田

^①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料》第二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239页。

^② 季云飞：《论辛亥前后国民政治心态的演化与辛亥革命的失败》，载《江海学刊》1991年第3期。

起义时，其人数不过两万左右，而打到南京时已号称百万之师。在两湖，太平军所向披靡，沿途群众纷纷加入。但是在北方它的影响却远不如在南方。1853年太平军出师北伐，不计后来派出的援军，总兵力在四万左右。北伐军虽然在初期取得很大战果，然而在力量上则增长有限，经常陷入物质匮乏的境地，最后也因弹尽粮绝、敌我力量悬殊而败，其境地与太平军在南方备受人民拥护的状况形成了鲜明对比。我们在分析太平军失败的原因时，固然可以说太平军北伐军在战略战术上的错误，以及它不注意发动群众等种种不足，但有一点不能否定，就是南北农村由于传统观念及耕作方式、生活方式的差异带来的南北农民的群体心理状态的不同，使他们在对待太平军及拜上帝教的态度上有所不同。三十六年后，当北方掀起轰轰烈烈的义和团运动时，南方却异常平静，南北形成鲜明的对照。这个现象当然也不是一个“东南互保”就能解释得清楚的。要想弄清真正的缘故，还必须分析南北社会特别是农村农民的社会心态。这一问题及其相应的其他问题，如宗教、乡村教育机构、农村宗法制度等都值得我们下大力气研究。

需要指出的是，当我们运用社会心态进行研究时，应该避免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任何研究的观念和方法与任何事物一样都不可能是尽善尽美的。社会心态研究一方面弥补了传统史学只注重英雄人物与重大事件的缺憾，但同时它也使历史研究的方法与手段复杂化，而且很容易在研究中渗入研究者的主观臆想。这些都是我们必须克服的。而且我们还应注意到人类社会的不同意识、情感、精神包括宗教与传统都不是凭空产生、虚无缥缈的。它们都耸立在“不同的所有制形式”和“生存的社会条件上”^①，是一定的经济环境、历史条件和社会结构的产物。因此，我们必须明确社会心态的研究只是历史研究的一个方面、一种手段，绝不能以此替代社会经济基础和物质生活的研究。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31页。

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心态

在鸦片战争的隆隆炮声中，西方殖民者用铁与火的暴力轰开了中国封闭的大门，使中国出现了“数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中国骤然卷入了资本主义世界的漩涡。首先在这个历史漩涡中磕碰的，是刚刚被动跨入近代大门的士大夫群。迫于当时中国岌岌可危的社会危机和民族困境，他们中间一些具有民族气节的有识之士率先开始了深刻的反思。于是，一个不拘于传统观念，要求社会变革，作为民族精英的先进知识分子群体在士大夫营垒中脱颖而出。他们以崭新的群体心态和人格形象进入社会舞台，自觉地担负起拯救民族、振兴中华的重任。

一、近代知识分子的转变和发展历程

历史学中“心态”、“社会心理”等概念是从西方借鉴过来的，根据著名史学家勒戈夫考证，法语的“心态”一词来自英语，英语的“心态”一词出现在17世纪，是17世纪英国哲学的产物，指的是集体心理，即“人们，一个特定的人们集团等等”所特有的思想和感知方式。最初英语中的这个词只是哲学术语，而在法语中该词却很快被广泛应用起来。启蒙运动后，法语“心态”一词具有了“心理状态”这一更为宽泛的内涵，后来被年鉴学派广泛应用于历史研究之中。^①

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重要功能是治国平天下，因而其社会角色和西方学者的社会角色大相径庭。一个西方知识分子一般都认为应该站在政治圈之外，而在中国，却认为这样做就是失职。^② 在传统中国，知识分子自从由一般劳动者中分离出来后，基本上就处于政治场合的中心，不管其时其身处在何处，其思维的主题始终不曾有须臾偏离。

① [法] 雅克·勒戈夫、皮埃尔·诺拉主编：《史学研究的新问题、新方法、新对象》，郝名瑞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272页。

② 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第173页。

中国知识分子由传统向近代的转换和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艰难的历程。这一过程是与中国资产阶级新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过程相联系的。这种联系不仅表现在知识分子的近代转变本身就是近代中国文化的重要内容，而且表现在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新文化的成长有赖于它的创造与传播的主体——近代知识分子的形成与发展上。从这一基本的认识出发考察知识分子的近代转变和发展过程，它大体经历了以下六个时期。

鸦片战争时期。这一时期是中国知识分子从传统到近代的蜕变时期，也就是一个过渡的、中介的时期。从心态的角度考察，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显现出两重性。一方面，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产生了一种“认同危机”，同时也对自身所担当的社会角色产生了疑虑；另一方面，他们在传统文化的深厚土壤的熏陶下，依然对传统有着浓烈的依恋情结。使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在价值取向上表现出“中体西用”的选择模式。从魏源、林则徐到郑观应、薛福成，都反映了这一时期知识分子的基本特征。

洋务运动时期。19世纪60年代以后，中国的变革进入了实际阶段——洋务运动兴起了。洋务运动，从其本质来说，只是传统士大夫中的有识之士，依据“中体西用”的价值模式对传统社会进行修补的行为。但是，它一旦开始，便不可避免地引进了一些与传统社会不相适应的因素，并因此而导致传统人士的新蜕变，演进出新一代的知识分子。伴随着洋务运动的出现而形成的这一批知识分子，他们从洋务运动中获得利益，但又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洋务思想。所谓“早期的维新派”就是他们的代表人物。他们大都是追随洋务派官僚从事洋务活动的人物，如马建忠、王韬、郑观应、薛福成和容闳。而且，他们当中还有不少曾游历国外，并有从事近代报刊工作的经历。这种有利的条件，使他们大量地接触了西方的自然科学、人文科学以及政治制度与社会生活，开阔了视野，因而能在更广泛的层面、更深的层次上对中西之学进行比较和选择。

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时期。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的近代转变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这就是近代型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从本质上来说，近代型知识分子群体是反映新兴的资产阶级利益与要求的社会群体，是新兴的资产阶级在文化上乃至政治上的代表，是属于资产阶级范畴的一个社会阶层。从文化背景来看，近代型知识分子群体的产生，乃是鸦片战争以来西学传播、传统文化逐渐衰落的必然产物。西方资产阶级的文化观念、价值观念的传播，

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传统士大夫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而 19 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新式教育的兴起，特别是清末科举制度的改革、学校的兴办，造就出大批新式的知识分子。根据统计，在 20 世纪初，留学生以及全国高等学校、各专门学堂、各级师范学堂毕业和在校的学生已达 15 万人之多，加上在教育、新闻出版、医疗卫生及各种新式文化事业机构的从业人数，属于新式知识分子范畴的人数，估计在 20 万 ~ 25 万人左右。^① 近代型知识分子群体与传统士大夫的区别，在于他们的价值取向与知识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他们从旧式教育中挣脱出来，启蒙新文化思潮，宣传近世西方文明，改弦易辙求“新学”。主要代表人物是梁启超、孙中山、严复、章太炎等。他们不仅在当时社会舞台上扮演了先驱的角色，而且培植了后一代知识分子所需的思想养料。这一时期知识分子内在世界里的新旧斗争依然十分激烈，新旧参半的现象仍然严重存在。

五四运动时期。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猛烈抨击传统文化，献身新文化运动，确立了近代中国以“民主”和“科学”为其旗帜的反传统主义运动的基本趋向。他们希望“民主”与“科学”这两位“先生”“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的一切黑暗”^②，通过办刊物、兴学校、组织革命团体和巡回演讲，给予封建制度及其意识形态以狂风暴雨般的扫荡，因此唤醒了许许多多蒙昧的国人，把大量的青年知识分子引导到了革命的前沿，使“科学”和“民主”等新文化观念在神州大地上广泛传播开来。他们以陈独秀、胡适、鲁迅最富有代表。

大革命时期。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注重文化的政治效益，从文化革新走向社会改造，将新文化理论与社会运动相结合，造就了轰轰烈烈的中国革命。他们是在五四运动的社会政治风雨中成长起来的，接受了新文化的洗礼，在新文化的思想启蒙下走上民主革命道路，但他们更希求建立一个新的近代民族国家，以满足五四运动以后日益高涨的民族运动的要求。因而他们更重视那些能够理解、应付和把握社会实际的思想方法，对于抽象的理论思辨并不怎么感兴趣，沉重的社会压力、艰巨的民族重任、紧迫的历史责任感促使他们将自己的命运

① 王继平：《论晚清知识分子的文化转型》，载《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0 年第 5 期。

② 陈独秀：《本志罪案之答辩书》，载《新青年》1919 年第 6 卷第 1 号。

同改造恶劣的现实环境紧密结合在一起，他们更多地介入社会，参与实际生活，注重自己社会角色的扮演。毛泽东就是这一时期的一个典型代表。

二战和抗战时期。二战初期的知识分子试图树立文化的主体意识，寻求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独立，继续向文化深层掘进，将中国文化发展推向新的高潮。他们经受了对革命的希望、失望到最后绝望的嬗变过程后，将自己的重心转向文化事业，希望从深层挖掘中国社会文化的内部结构。巴金、老舍、曹禺等是这一时期的代表。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知识分子为适应中国全民抗战的需要，把文化引向大众，掀起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民族文化新热潮。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不可能再聚居在沿海繁华的城市里。由于北京、天津、上海、南京、广州、武汉等市先后沦陷，广大知识分子纷纷向内地西北、西南等僻壤之地聚集。昔日的边陲之都——重庆、昆明、成都一下子成为知识分子的栖息地，特别是延安，成为抗战青年知识分子汇集的大本营。这时期知识分子的主体思想几乎都是围绕抗战救亡、重建民族文化这一主题来展开的。冯友兰、贺麟等是这一时期的代表。^①

二、近代知识分子主流的群体心态

1840年以后的近代中国社会，接踵而来的民族灾难、亡国灭种的危机，强烈刺激着作为民族精英的知识分子寻求救亡图强的道路。尽管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上，他们也曾分出过一些的派别，间或彼此还有重大的分歧和纷争，但是，在探索摆脱民族危机、拯救国家危难、救万民于倒悬这一重大的历史课题面前，他们殊途同归，异曲同工，都进行了不遗余力的思考、比较与选择，都曾经历过痛苦煎熬和挣扎，不少人甚至为此流洒鲜血，献出生命。归纳起来，近代知识分子主流的群体心态包括几个方面。

（一）爱国心态

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挽救、改造中国，使中国走向民族独立、自主和富强，救民出水火，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爱国心态的恒定主题；学习西方，向西方寻求救国之路是贯穿在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爱国心态的主流。

^① 欧阳哲生：《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选择》，载《社会科学战线》1994年第3期。

爱国主义是人类的一种基本和可贵的品质，是人们对于自己的乡土、历史、文化传统的深厚感情。这种感情是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发育、生长、成熟的，无论人们来自社会哪个阶层，有着何种宗教信仰，心底都有一种共同的东西——眷土爱国之情。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自强不息的精神支柱。正是这一精神支柱，使得近代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在关系到民族生存、国家命运的重大关头始终保持民族气节，以民族利益为重，置个人祸福荣辱于度外，坚持反侵略的正确道路。例如，林则徐即使在坎坷窘境之时，也还是念念不忘“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他把社稷的安危、民族的兴衰，作为自己的头等大事，即便以死相报也在所不辞。姚莹在战争中因积极组织抗英活动而遭迫害贬至四川，但他也没有消极避世，而是数年如一日地致力于世界各国情况的研究，寻觅抵抗外侮的良策。也正是出于炽热的爱国情感，这些先进知识分子在投降派对外国侵略者的坚船利炮望而生畏、消极悲观，顽固派还继续做着“天朝”尽善尽美的迷梦、拒绝一切外来先进事物的情况下，敢于正视现实，承认中国的落后，主张学习西方的长处，坚信中国人完全能够掌握外国人的长处，从而战胜外国侵略者。

睁眼看世界，使国人第一次放眼纵物，位于历史前沿作为民族精英的知识分子看到了自己维护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的道德正义还必须配以先进的武器，他们学西学，译西文，学西语，试西医，编著西方地理、政治书籍，引进西洋船炮，谋划建立西式海军，甚至请来华因船只遇险而幸存的英国医生帮校译书，代向英国女王发照会，^①进而提出并实践“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等等。

随后的洋务造成了东方的煤铁炮舰，改良维新引进了先进的政治文化，而辛亥革命则实现了政治翻身，五四运动就是一次全方位的思想解放，最后新型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则宣告了近代知识分子爱国主义的全面转型。

（二）忧患心态

龚自珍以其犀利的笔锋给人们展现了一幅晚清社会危机重重的图景：“自京师始，概乎四方，大抵富户变贫户，贫户变饿者，四民之首，奔走下贱，各省

^① 中国史学会编：《鸦片战争5》，载《中国近代资料丛刊》，神州国光社1954年版，第321—326。